

施展 著

# 枢纽

3000年的中国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施展 著

# 枢纽

3000年的中国



GUILIN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Shuniu: 3000nian de Zhongguo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枢纽: 3000 年的中国 / 施展著.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1 (2018.1 重印)  
ISBN 978-7-5495-8608-0

I. ①枢… II. ①施… III. ①中国历史—通俗读物  
IV. ①K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94673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三路 18 号 邮政编码: 100176)

开本: 88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 22.5 字数: 500 千字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60 001~128 000 册 定价: 99.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施展

现任教于外交学院外交学系，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2008年于北京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曾于巴黎大学访学。研究方向为政治思想史、政治社会学、历史哲学、国际政治。曾发表专著《迈斯特政治哲学研究》，另有学术论文数十篇，时评文章数十篇散见于诸多刊物、媒体。

作者个人公号：施展世界

iHuman

新民說

成为更好的人

# 序

施展送来他的大作，希望我给他的新书作序。

施展是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组织的学术共同体“大观”团队的成员。我2007年应邀担任世观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那时我就提议研究院要发现、扶持青年研究人员，组建有持续性的青年研究团队。“大观”团队自2008年开始运行，就一系列课题进行了持续研究，包括重新认识中国的周边世界，重新理解中国成长的世界历史意义。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大观”团队近期的研究重点，落在了对中国革命的伟大成果向现代国家转化的历史过程的研究上，开辟了“社会主义改革时期国家理论”这一新的研究领域。“大观”团队的年轻人还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未来的世界秩序是由中国加入这个秩序的过程所塑造的，中国的成长与转型只有在这个过程中才能实现。我非常欣赏和支持这个观点，这个观点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的，也是符合中华民族近代以来一百多年的奋斗历史的。

施展在“大观”团队中，非常用功，多次深入到实际工作当中，览群书，行列国，积累了见识，逐渐形成了有他自己特点的一系列见解。现在，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他把这些观点系统地扩展为约50万字的一部专著，值得庆贺。

在此书中，施展试图在一种新的全球史视野下，重新理解传统中国以及以中国为文明核心的东亚世界的历史；并把这个东方世界与西方世界的相遇作为伟大的中国革命的历史背景，考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他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及其观念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世界观念，促使中国的现代化转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推动着中国高速成长，中国力量正在融入并重组世界秩序。作者在书中详细分析了这个宏大历史过程的内在机理。看得出来，作者有意避开了传统或经典的通史叙述方式，而以政治统治和社会治理的秩序演变为线索，以秩序构成诸要素的分析作为全书的主要内容，形成了气象壮阔的论述格局。当然，这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中国通史，也不是专门的政治学著作；这是这一代青年人在大时代进行大构想的一个可贵的尝试。

无论如何，世界已处于根本变化之中，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亚非几十亿人民蓬勃发展，此长彼消，旧的世界观国家观正在瓦解，新的世界观国家观正在走上前台，引导全球秩序的新格局。对于这种新格局的认识，需要有新的理论努力和勇气。正如傅莹同志在今年的瓦尔代会议上引征施展的观点后所言：“超越地缘政治既是中国发展的切身体会，也是世界发展的潮流所向。未来，世界各国应该携手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是退回到地缘博弈的格子里去。”<sup>1</sup>

施展在书中提出一系列设问，也提供了相应的回答。其中肯定会有很多会引起争议和讨论。我一向支持这样可以引起讨论争议甚至批判的文章，这样我们的思考才可以精进。当然同时我

---

1 瓦尔代会议是俄罗斯组织的年度国际学术会议，2017年已是第十四届。普京总统参加了历届会议。今年傅莹同志在会上做了题为《要冲突还是要合作？超越地缘政治思维》的发言，并在发言中引征了施展的观点。

也希望施展要不断修正发展自己的思考和理论,因为这部著作的主题甚为宏大,应当在争议讨论中发展,以虚心求真务实的态度持续研究下去。期待以后还可以看到修订版。

在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九大会议上,习近平同志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历史判断。这个伟大的新时代不仅要求执政党提出新的思想、新的方针路线,还向我们中华民族提出了新的理论思维的任务。恩格斯曾经说过:“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离开理论思维。”一个民族的新的理论思维就是这个民族青年一代的理论思维。我这一代人,饱经国运沧桑,目睹历史曲折,深感理论思维薄弱,民族尚处追赶途中,容不得半点骄傲与松懈。万望青年一代学者,屏息聆听历史的脚步声,苦思冥想,深思熟虑。伴随着国家强盛,民族也达致理论成熟,这也正是施展在书中所提到的世界历史民族的双重含义吧。





## 导言

# 十字路口的大国与历史热

最近几年,中国兴起了历史热。图书市场上出现了大量从各种视角重写中国史的著作,既有国人的著作,也有译著;既有传统式的史学著述,也有跨学科的历史研究,并且往往都出人意料的大卖。<sup>1</sup>

<sup>1</sup> 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可以看到如下有代表性的著作与学术努力。赵汀阳先生在《天下体系》《惠此中国》等著作中对于“天下”观进行了着力阐发,力图在传统中发掘出现代中国的普遍主义视野之可能性,许纪霖先生也在多篇论文中做过相近的努力;但是对于“天下”观念的再发掘,忽视了塞北、西域等地区并不是由儒家文化主导,因此对这些边疆地区的说服力和解释力可能会遇到困难(近年可看到许纪霖先生有了对于边疆问题的大量关注),并且从观念到观念的叙事,也会流于空泛。葛兆光先生在《宅兹中国》《想象的异域》等著作中通过对周边朝贡国史料的挖掘,呈现出从周边看中国的不同视角,对于纯粹基于中原的秩序想象是一个很大的思想刺激;但这种视角同样将遇到“天下”体系所会遭遇的质疑。姚大力先生、罗新先生的诸多著作,从草原史、内亚视角开启了不同于中原视角的中国史反思;这种反思非常有启发性,但对于内亚与中原的历史共性何在,尚需给出更进一步的解释。王柯先生在《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一书中,对于中国内在的多元性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但对于多元要素的共性基础的发掘还需进一步深入。赵鼎新先生在《东周战争与儒家国家的诞生》等著作中,回溯到中国历史的早期,从战争与政治秩序的生成关系的角度再论了中国史;这种分析角度使用了以往史学研究中较少运用的社会学方法,但是对于非中原地区的解释力仍嫌不足。王明珂先生、马戎先生等从人类学的角度,对中华民族的概念进行了全新的思考;这样的人类学思考对于历史学是一个巨大的补充,但是过于强调了社会层面的自生秩序,而对政治层面建构秩序的同情式理解似有不足。国外学术界在这方面也有相当多的思考,诸如美国新清史学派对于大清帝国的内亚性的探讨,日本京都学派对于中国史的重构,以及剑桥的中国史系列、哈佛的中国史系列等等。这些思考都极富启发性,外国学者有他们不同于中国学者的问题出发点,因此更多是他山之石的价值,而不足以成为中国理解自身的基础。此处的梳理,只是从有代表性的几个入思角度展开,必定挂一漏万,除笔者所列学者之外,还有许多学者做出了大量值得钦佩的研究,笔者的思考也从中受到许多启发,篇幅所限,恕无法一一列出。

实际上,历史热这种现象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揆诸世界历史,一个迅猛崛起的大国,其崛起本身会造成所处体系的深刻变迁,过去所习惯的参照系不再起作用,基于该参照系所设定的国家目标也会失效;于是,它无法再说清自己是谁、自己想要什么、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是什么,往往会陷入一种深刻的身份焦虑。它懵懵懂懂地走到了没有路标的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从。在这个路口上,倘若它能够在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中,理解到自我与世界的内在一致性,就能够将其庞大的力量转化为对世界的建设性力量,并真正成就自己的世界历史地位;否则,它将浪费自己所经受的苦难。为了真实地理解自己的处境,以避免糟糕的前景,处在十字路口的大国往往都会关注历史,它们渴望通过对于历史的重新理解,来廓清当下,构想未来。

这种身份焦虑的化解,无法简单地通过对于某种价值理念的表述及追求而完成。一个政治共同体的自我身份,要基于两种理论叙事的构建:一是政治哲学的叙事,它会为该政治体确立其所要追求的正义之目标;一是历史哲学的叙事,它会确立该政治体的认同边界,确认何者为自己人,何者不是自己人。两种叙事加在一起,才会带来政治体的精神凝聚力。单纯依靠政治哲学的价值表述,无法回应共同体的特殊历史处境;单纯关注历史的特殊性,则无法理解共同体与世界之间的内在一致性。当下中国的身份焦虑,实际上表达着对新的历史哲学或者说新的历史叙事的渴求;人们渴望通过对于中国各种特殊性的统合性叙述,来寻找中国通达于普遍性的根基,以化解对内对外的各种精神紧张。简单来说,就是要在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意义上,回答“何谓中国”这一问题。这样一种新的历史叙事,直观上呈现为对过去的重述,实际上是在勾勒未来的方向;换言之,我们对于未来的想象,是基于对过去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就是未来学。

要构建新的历史叙事，首先需要有对于中国历史的特殊性的理解。只有基于对特殊性的深刻理解，才能把握其在普遍性当中的结构性地位。那么，中国历史的根本特殊性在哪里呢？

本书认为，它体现在两点上：一是中国是一个轴心文明的载体，一是中国的超大规模性。这两点以一种人们经常意识不到的方式相互发生作用，几乎中国历史的所有运动逻辑，理解当下中国问题的所有切入点，都在对这两点的把握里面了。

所谓轴心文明，即在公元前 800 年到公元前 200 年之间的轴心时代出现的原生性文明。这个时候出现的中国文明，或许曾受到过其他文明的激发，并且在后续的年代中吸纳了很多其他文明的精神资源，但其内核中一些原生性的东西，作为基本识别要素，始终存在。轴心文明的特征在于其普世主义取向，绝不自囿于一族一地，而是以天下为思考单位；对应地，轴心文明不会设定自己由某一特定族群担纲，它所关注的只是文明本身是否获得普遍传播。轴心文明的这一特征，使得中国的精神结构中天然地有着普遍主义的冲动。在古代，它将自己理解为世界本身；在现代，它只有通过普遍主义才能理解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因为单纯的民族主义理念无法提供足够的精神容量，以支撑起它的精神世界。

很多轴心文明在历史过程中都丧失了自己的政治载体，但东亚的轴心文明却一直有中华帝国作为其政治载体，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历史效应。之所以会有这种差异，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中国的超大规模性。超大规模首先体现在中原地区的庞大人口与财富上，其规模达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在第一个千禧年过后，朝廷（中央）所能低成本汲取的资源超过了任何地方性势力的抗拒能力，此后中国再无长时期的分裂现象出现，于是就有了国人经常说的“唯一历史未曾中断而延续至今的文明古国”。其延续性的根基并不仅仅在于其文明的韧性，更在于超大规模所带来的军事

与财政逻辑。

说得更准确点，一个庞大政治体的自我维持，与轴心文明的存续，是两个独立的逻辑，并不能相互解释，但是相互有需求。这个文明在其覆盖区域内始终可以找到一个独大强国作为其载体，该强国则始终可以该文明作为自己的身份识别标志。而在其他文明区域内，由于没有这种超大规模，没有足够的可供低成本汲取的资源，因此能够压制各种地方性力量的独大强国就很难持续存在；也因此，若干彼此相持不下的强国，便不会以文明作为自己的根本身份标志，以免混同于其他国家。

中国轴心文明的担纲者在古代的流转，最终必会落在起自农牧过渡地带的人群身上，过渡地带分布在长城沿线及东北。因为只有这个群体同时熟稔农耕与游牧两种体系的秩序奥秘，能够带来超越于农-牧之上的多元治理，使长城南北的紧张关系转化为统一帝国的内部均衡关系。他们对中原的理解能力使其能够调动中原的庞大财富，这是纯粹的草原统治者很难做到的；他们的草原身份使其拥有超越于中原的广阔视野，有能力统治儒家文化无法直接整合的庞大非中原疆域，这是纯粹的中原统治者很难做到的。因此，这个群体能构建起庞大的多元复合帝国，使得轴心文明所构想的“天下”，外化为一个现实的帝国秩序。这种多元复合帝国也带来了中国的另一重超大规模性，即地理上的超大规模性和帝国内部秩序上的超级复杂性。这两个意义上的超大规模性，使得中国在现代转型时面临的任務变得极为复杂。

在担纲者的流转过程中，中国历史经历了复杂的变迁，变迁的主动要素，或说自变量，来源于社会分工最为复杂的中原地区。相对于非中原地区而言，因其分工的复杂性，内部各种社会要素的均衡关系更为易变。每一次出现有历史意义的技术跃迁，都会给中原带来新的经济资源，并打破此前诸种社会要素的均衡关

系,也就是打破原有的社会结构。旧有的和新出现的各种社会力量,会在动荡与博弈中走向新的均衡,中原的社会结构就这样经历过几次深刻变迁,从商、周之际的封建社会转化为汉、唐之间的豪族社会,再到宋、清之间的古代平民社会。社会结构的变化,会改变中原地区的财政与军事逻辑、帝国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相对力量关系、轴心文明的经典阐释框架,以及中原地区与非中原地区的互动模式。

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这片被称作“中国”的东亚大陆的土地上,数千年的历史呈现为一个多元体系的运动过程。这个体系内部包含着中原、草原、海洋、西域、高原等几种主要的自然-社会-经济生态区域,各个区域彼此间有着极为深刻的相互依赖、相互塑造的关系,以至于脱离一方完全解释不了另一方。几大区域构成的多元复合结构里,历史运动的主线是草原、中原、海洋这三大区域的互动关系;西域和高原这两大区域构成副线,它们就像催化剂,影响着主线的发展路径和历史节奏。这样一种深刻的有机联系,让各个区域互为条件,构成一个多元共生体系;所谓“中国历史”,就是这个多元共生体系的演化史。这一体系不断地寻求着从多元主体相互对抗的外部均衡,演化为多元复合帝国的内部均衡;中原地区每一次社会结构的变迁,都将打破业已演化出的多元帝国的内部均衡,于是体系会回到外部均衡,前述运动过程在更高一阶上再重复一轮。这构成了中国历史的循环上升的逻辑过程。

经过几轮的反复演化,这个多元共生体系在其古代历史中落实为大清帝国,汉满蒙回藏多元主体都被纳入统一的帝国之中,接受多元的统治。就当时的技术条件而言,一种真正的普遍性达成了。然而,新的困境也就此到来了,它体现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

就物质层面而言，在内部均衡所带来的和平红利下，中国人口过度繁衍，出现大量过剩人口，导致中国经济陷入一种特殊的困境而无法脱出。过剩人口带来过于便宜的劳动力，使得以节省劳动力为目的的技术变迁无法出现，因其不具备经济可行性；中国因此便无法内生性地发展起工业经济，因其以新的技术变迁为前提；而不能从农业经济进展到工业经济，便无法吸纳过剩的人口。中国于是自我锁死在一种低水平状态上，有学者称此一状态为“内卷化”。中国由此便有陷入一个恶性循环的危险，因人口过剩导致流民四起而造成的治乱循环，可能会反复上演；这种循环无法像此前的历史那样，带来社会的结构性演化，而只有无变化的重复，便不再有任何历史意义。就精神层面而言，朝廷能够从这个超大规模人口的社会中汲取到如此多的资源，以至于社会已不再拥有对于朝廷的制衡力量，轴心文明对其信徒所承诺的尊严，也将在政治的压制下逐渐落空，轴心文明的精神内核有可能逐渐枯萎下去。

除非有外部资源注入，才可能突破这两重困境。因此，中西之间的相遇便成为中国历史继续发展的一种内在需求，中国在内外各种压力的综合作用下，加入世界秩序，走上了现代转型的道路。

中国的超大规模过剩人口，只有在作为封闭经济体的情况下，才会导向“内卷化”的结果，一旦加入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反倒会成为中国的竞争优势。但是，这种优势要想能够真正释放出来，中国必须先完成政治整合。如果没有政治整合，就直接加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便有可能被彻底撕裂化。这个问题又一次与中国的超大规模相关。

中小规模的国家，仅仅靠外部世界的经济拉动，便可被整体性地拉动起来；中国倘若只靠外部拉动，仅会被局部性地拉动起

来,也就是诸如上海、广州之类的口岸地区,它们和纽约、伦敦的联系,会远远大于它们与几百里之外中国乡村的联系。这是19世纪后期、20世纪前中期的现实历史。这些被拉动出来的飞地经济与社会,与那些无法被外部拉动的庞大乡村地区,会形成深刻的撕裂;这样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一定会导致剧烈的内在冲突,乃至内战。所以,中国这种超大规模的国家要完成现代转型,必须先实现政治整合,然后才能让这个国家整体性地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并且把中国的巨量人口转化为竞争优势;这个步骤如若走反,就会在内在撕裂中吞噬掉各种局部性的发展。

要实现政治整合,革命就是绕不开的选项;革命的代价巨大,但超大规模国家要实现现代转型,几乎无法避免。这就有了20世纪中国跌宕起伏的革命历程。

实现了自我整合的后革命时代的中国,在进入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后,其超大规模人口终于焕发出巨大的力量,成就了难以想象的经济奇迹,深刻地改变了全球的经贸结构,全球政治秩序、经济秩序乃至社会秩序在此过程中出现失衡。中国因其超大规模性,对化解这种失衡有着特殊的责任;同时,失衡有可能对于全球化造成伤害,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因此对化解失衡也有着深刻的利益关涉。

正是在这个阶段,我们过往的许多精神资源,在解释这种新的格局时失效了;我们过往用来理解自身与世界所依凭的参照系,因中国的崛起而发生了巨大变化,也失效了。中国走到了十字路口,发现似乎越来越难以理解自身与世界了。因此,重述中国的历史、重构我们的史观便成为一种必须,如此才能让我们获得精神自觉,把握住这一切过程的深刻历史含义,进而构想更加可期的未来。

新的历史叙述必须能够在以下诸方面发现特殊性之上的普

遍性和多元性之上的一致性：在空间意义上，发现中原与非中原地区的内在一致性，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内在一致性；在时间意义上，发现古代历史与近现代历史在精神现象学逻辑上的内在一致性。如此，则内安边疆，外安四邻；如此，中华民族潜意识当中的普世主义冲动、直观可见的超大规模属性，以及其中所隐含的世界历史民族的潜力，才能真正地获得释放和通往建设性的方向。

在对中国历史做过如此反思的基础上，本书对“何谓中国”这一问题的回应，可以简单表述如下：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国家，从内部来看，它是个体系，从外部来看，它是现代世界秩序当中的海陆枢纽；中国也正是因其内在的体系性，成就了其外在的海陆枢纽地位。

现代世界秩序有三大构成性要素，分别是海洋秩序、大陆秩序，以及海陆中介/枢纽秩序。作为体系的中国，内在地包含着海洋和大陆等多种要素，它们通过历史的演化与现代的整合，而凝为一个共同体；中国因此得以同时嵌入在现代世界的海洋秩序与大陆秩序之中，作为海陆中介/枢纽，因其超大规模而获得动能，将人类秩序联为一体。这是中国作为世界秩序自变量的真实体现，是中国作为世界历史民族的责任担当。

笔者与“大观”学术小组的诸位同人共同研究已历八年之久，其间通过激烈的学术争吵而发现真问题的过程，为了理解真问题而进行的各种思想操练，以及因各种机缘而得以参与的实践，实令笔者受益极丰。“大观”小组的诸位同人各有术业所长，在相互砥砺的过程中，让笔者不断见识各种跨学科的视野，见识各种思想的张力。本书便是在这八年来思想砥砺的基础上完成的。当然，书中有何错漏，文责自应由笔者承担。

由于本书所要处理问题的复杂性，使得本书的叙述，无法在



任何单一学科的话语当中完成,必须在地理、历史、哲学、思想、经济、财政、货币、军事、人口、社会、法律、国际政治等各个学科领域的综合下,才能对中国这数千年的复杂历史、百年来的成败兴衰,以及这一切与世界的关系,给出统一连贯的解释框架。

笔者深知,此书所涉问题过于宏大,所触学科过于庞杂,以笔者的浅陋见识,在各种领域的讨论都只能是浅尝辄止,对任何一个领域的文献的理解与调用也必定是挂一漏万。唯望书中所触及的学科与话题领域的专家,原谅笔者在专门领域的见识不足,而在笔者所尝试构建的整体框架上给出更多指教。

笔者也深知,本书的写作很可能是一个过于大胆的尝试,因此不敢期待书中建构的历史叙述框架能够说服足够多的人。唯愿其中所论或有些许价值,能够真正地打开新的论域,激起一定的讨论,以使我们民族对于自身的历史处境形成更清晰的自觉,这大概就是笔者对本书所能拥有的最大期待了。

施展

2017年3月1日于京城